

英属婆罗洲的日本人：投资移民期（下）

[日]原不二夫

没有得到正式承诺的“自营业者”们愈加愤怒，他们组成“拓指团”、“突击队”，进入了全面对决的态势。震惊的谷口领事8月12日从“自营业者”方面召唤了齐藤等4名代表，从公司方面召唤了所长前田、总务科长滨崎、拓务技术员鲛岛等3名。谷口从双方听取了情况后，

谆谆告诫他们说，今日的帝国面临着应称为超非常时期的重大局面……。一切劳动团体及政党都要解散，真正地实现举国一致的国策……。像似破坏国民的合作一致、阻止国策实现的这次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不仅不能得到一般日本国民的同情，而且从身在祖国的国民的真挚的爱国心来看，诸君的确是“非国民”……。（1941年2月18日，谷口卓领事给松冈外相的密码电报）

这并不是调解，而是对一方的威胁。

如果被作为当地日本人间体的绝对权威人士、日本国代表的领事称为“非国民”，移民们大概就不知如何抗辩了。在日本国内所有的劳工运动已经碰壁，辅弼体制正在形成的时候，北婆罗洲的日本人社会也没有例外。

齐藤们提示了他们与公司达成协议的文件，作为公司方面承诺“自营业者”要求的证据，但领事认定是“自营业者”“强求日产公司制成的文件”，并没收了“自营业者”所持有的那些文件。而且，领事还要求说，“事件突发以来又回到了任何新事实都未形成的状态……请无条件地让本官圆满地解决”。即裁定，协议书作废，“拓指团”、“突击队”解散，公司则予以提高相应的工资。从双方的力量关系来看，“自营业者”方面只能接受这一条件。

受双方委托的谷口8月19日前往斗湖，提示了提薪方案。内容为：（1）将最低日薪（60分）增加60%；（2）其他日薪（最高75分）增加40—50%；（3）承包工资增加40%。基本上恢复到降低工资前的水平。谷口本人甚至说，“针对移民的生活窘状，提高60—70%的工资也是不得已”的（谷口，同上），因此虽然“自营业者”方面的不满仍很强烈，但只能再次接受。公司方面在这个方案提示之前已经与领事充分地商量过了，因此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或许反过来拓务省增加了给公司的补助金。

协议成立后，事业恢复正常，而后按照外务省、拓务省、日产、北婆罗洲当局之间以前秘密谈妥的步骤，将“主谋”齐藤、遊佐强制送回了日本。这样，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总共第三次的、而且是最大的、大概也是最后的日本人移民组织的罢工便宣告结束。

（5）台湾人移居事业

日产（久原农园）于1916—1918年“输入”台湾人苦力，但台湾人也与日本人农民一样忍受不了严酷的劳动环境，其事业没能持久。但是，在台湾总督府，由于受到“移民循环论”等的影响，其后似乎也一直在探讨着岛民移居北婆罗洲事宜。前述的《斗湖地方事情》（1934年）也就台湾岛民叙述道，“移居到气候和生活方式比较相似的当地是最合适的……。不仅内地人，也要移植岛民，普及日本的海外发展……是很有意义的”（第94页），

显示了积极的姿态。从这时开始,在日本方面的相关人员之间似乎就已经为实现设想的目标进行着活动。1938年初,遵照台湾总督府的指示,台湾拓殖代表奔赴斗湖,与当地日本人“殖产公会”之间制定了台湾人(30户90人)雇用计划。根据计划,台湾人作为苦力受雇于“殖产公会”2年后,从该公会接受土地供给而独立,但受台湾总督府委托在台拓、公会之间斡旋的桑折领事在1938年3月12日给广田外相的书信中叙述道,“殖产公会是自营农户的团体”,但还不是“有很强实力的组织”,因此“考虑到计划的成否关系到将来的移民事业,希望慎重对待”。

这个移民计划最初是在1938年4月8日的《台湾新民报》上发表的,该报在简述了计划后说,如果这个划时代的试验获得成功,就可继续送出第一批、第二批。如前所述,该报道令淡水的英国领事馆很吃惊,便紧急向北婆罗洲政府做了报告(4月11日)。4月底,受到北婆罗洲政府召唤的桑折领事解释说没有收到任何联系,便摆脱了这个局面,与外务省协商之后,5月底回复说,“关于今后详细的移民计划,将先通知总督,征得同意后才实行”,以此取得了北婆罗洲方面的谅解。在此期间,史密斯总督似乎很担心日本人组织的台湾人移民事业的大规模化,这在前面已经做过叙述,但该总督还预测道,“以往日本人农园输入了台湾人劳工,但他们不适当当地的气候。今后大概也无望获得成功”(4月22日给海峡殖民地总督的秘密书信)。于是便判断要把事业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总之不能让他们达到侵害政府权益的规模。而且,即使是北婆罗洲方面,也与日本人一样,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已是燃眉之急。双方都没有认为日本殖民地当局强制移居台湾人是人道上的问题。从外务省、拓务省、台湾总督府来看,台湾人苦力是让日本人移民抱有更多一些优越感的最好的办法,过去事业失败的经验等大概都不足以放在心上。

第一批当初预定30户90人(8户44人+单身18人。大人36名、儿童26名)减少到62人,6月16日乘坐“万隆号”从基隆出港。但不知为何同月23日乘该船到达斗湖的只有7户54人(大人32名、儿童22名)。8人是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下船呢还是逃亡?或是死亡?到了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另外,当时移民的身份保证人是日产农园和小杉佐喜郎(当时租借面积120英亩的私人农园主)。

8月22日,第二批12名大人到达斗湖。此后到战争结束到底达到多少人数?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人们认为除了1941年日英关系紧张时期,战前、战时仍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被“输入”。他们被斗湖周边的“殖产公会”所属的日本人私人农园所雇用,1941—1943年移居到莫士丁。也有人受雇于台湾拓殖农园。也有一说认为,“15户作为见习工移居而来,但“落伍者”甚多,实际移居的只有5个家庭。

台湾人在莫士丁与日本人一样种植马尼拉麻。如后文所述,到了日据后半期,马尼拉麻找不到销路,难以经营下去。受雇于日本人马尼拉麻园的台湾人苦力的状况自然更加困难。而且大多数成年男子被部队征用,并被用作文职人员(主要是中文翻译)。似乎也有被召集入队的人。他们在服从日军绝对命令的同时,即使勉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似乎也不能回归故土,就那样留了下来。

战败后(1945年末?),日军当局(第三十七军善后整理部)所整理的《当地留置财产(各商社)调查表》按法人(日产农林、斗湖产业等)、私人记载了北婆罗洲、沙捞越的日本人“留置”的不动产、动产价值。私人为北婆罗洲29名(仅私人农园,不包括莫士丁的“独立自营业者”)、沙捞越15名,其中北婆罗洲的6名是中国人姓名,因此大概是幸存下来的台湾移民。其余的大多数或在战乱中被杀害,或即使活着,大概也不肯与日军再次接触。另外,就“留置财产”中的土地价值来看,日本人通常为1万日元以上(最高的是沙捞越的佐藤勇吉,拥有15万日元),而中国人都只有几千日元。分配给台湾人的农地大概只不过10英亩左右。

不知该资料为什么被整理出来。后来，日本政府向日本人农民支付了一点补偿金，但对台湾人则1分钱也不补偿。

此外，据说战后“殖产公会”干部因有战犯嫌疑被送到新加坡的樟宜监狱，度过了2年监狱生活。也许与台湾移民的问题有关。雇用台湾移民，让他们在会员的小农园里劳动的是“殖产公会”。但是，建议、主导、强制实行台湾人移居的是台湾拓殖，是台湾总督府，是日本政府。就是让零散的日本人小农雇用处境更加弱小的台湾移民。小农本身是迫于贫困走出日本，每天埋头于重体力劳动之人，大概也常会过分要求雇员。何况来自殖民地台湾的移民被视为隶属民族。这些台湾移民恐怕也被过分地任意驱使。……在让日本人小农产生些微的优越感，加强其对日本的归属感的同时，把台湾移民的敌忾心从日本当局者移开，使其转向与其直接对峙的小农……令人感到在这项事业中也包含着这种意图。如果这种战犯嫌疑是基于台湾移民的控诉而产生的，那也应该是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

(6) 朝鲜人移居计划

1931年2月13日的《大连新闻》报道，为了将“在满（洲）朝鲜农民”从水灾、粮食价格暴跌、“中国官民的压迫排斥”（指1927年9月被驱逐的侨居朝鲜人）的窘状中拯救出来，“朝鲜人有识之士”正在制定移居北婆罗洲的计划。计划的中心人物是天津北洋大学教授金圭植，同样居住在天津的“兴士团”团长安昌浩、居住在上海的民族运动领导人梁启超（原《京城每日申报》主笔）3人。因梁启超与北婆罗洲总督理查兹（M. Richards）有深交，他们便请求该总督提供协助。梁与理查兹的深交始于理查兹任驻汉城总领事时，但我们并不清楚理查兹是否对朝鲜人运动表示理解。即使表示理解，大概也仅认识到它是让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产生动摇的棋子。

理查兹回答说，自己非常欢迎移民，因此先派视察团来。金教授们制定了送出居住在“满洲”的几十万名朝鲜人，主要让他们开垦水田的计划，从1931年1月前后开始多次与“满洲”的各个团体进行了协议。最初报道该计划的是汉城的朝鲜语报纸《东亚日报》（1931年1月29日），该报还附了表示怀疑的评论：“气温非常高，有湿气，尚未能断定对朝鲜人是否合适。……原始林非常茂密，极难开垦”。天津的日本总领事馆分几次向外务省报告了计划的概要，但不清楚日本如何参与计划，是否支持计划等。但是，汉城和大连的报纸不可能报道反对日本意向的计划，因此大概是与朝鲜独立运动无关的、领会日本意图的计划。但总之，驻天津总领事代理田尻爱藏评价为“相当难以成功”（1931年2月24日，给币原外相的报告）的这个计划大概因视察旅行的结果感到很难实现，因此未见天日便消失了。从朝鲜被赶到寒冷之地“满洲”，进而被“转送”到热带的北婆罗洲，朝鲜人农民应该也不会感兴趣吧。

此外，井上雅二记述道，在1912年6月视察马来亚各地时，在芙蓉的笠田直吉橡胶园看到了“来后不过半年”的“10名左右的朝鲜人劳工”，他们是“半岛唯一的朝鲜苦力团”（《谈南方开拓》，1942年，第211页）。可见从殖民地朝鲜征用劳工去南洋还是有先例的。

(7) 战争

到了1941年，日英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移民的入境实际上被禁止了。根据当时在日产农林的石桥庆道所言，日本船（班轮）最后进入斗湖是在1940年12月前后（大概指12月24日载着5户22人从神户出发的“三宝垄号”），以后让家属经山打根回国的人多了起来。1941年2月载着东本愿寺大谷光畅夫妇一行的“山城号”停靠港口，该船也载着几个家庭回国了。但是，能够回国也只是到1941年10月，以后便没有航班，动弹不得了。但据说日产的“移居者”不顾周边的嘈杂声，全体人员都留下了。

他们是连妻儿都作为劳动力移居的“移居者”。如果让家属回国，农园和家庭大概都

无法维持下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默默注视着形势变化的日本人大部分被北婆罗洲当局拘捕并投入收容所。他们中有日军进攻前经雅加达被送往澳大利亚的人（从斗湖带走204名，其中日产相关人员100余名）、收容于山打根海上的巴哈拉岛检疫所的人（526名，其中莫士丁的独立经营者63户410人）、收容于日产农园内“斗湖医院”的人（587名）等。在拘留于澳大利亚的204人当中，3名在当地死亡，192名根据日澳俘虏交换协定，1942年8月离开澳大利亚，经非洲回到了日本统治区。回到斗湖的有133名，其他在新加坡下船30名（其中被征用28名），前往山打根的2名，回到日本的27名。

在开战的混乱中，悄悄地在自己的小农园里生活的一名原娼妇被小偷杀害了。这似乎是“圣战”给移民带来某种结果的预兆。

巴哈拉岛于1942年1月19日、斗湖于同月24日落入日军之手，日本人平安地走出了收容所。

但是，回到斗湖、莫士丁的移民们已经过不上平稳的生活。首先，几名作为家庭支柱的成年男子被征用为马来语翻译、物资筹集员等。1943年9月底，撤销了对“南方”居留者的外国居住待遇，开始实施征兵检查。在包括沙捞越、文莱等的英属婆罗洲实施征兵检查已是败相明显的1944年5月，同年中期至战争结束，北婆罗洲有几百人（其中日产相关人员160名左右——根据石桥所言）被招集。据说无论征兵检查的结果如何，16岁以上36岁以下的全体男性都被招集。

另一方面，马尼拉麻园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日军当初采取了“没有必要作为运回物资而增产，只需维持现状”的政策。马尼拉麻除了用作渔网之外，也已经用作舰艇用网的材料，因此有必要维持生产。但是，1942年运回日本的马尼拉麻数量为1117吨，只不过1940年北婆罗洲总出口量（2825吨）的40%弱。那是因为船只不够而运输不了。尽管如此，军队当初为了准备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后重新开始出口，试图维持生产，不停止采购马尼拉麻。移居莫士丁一直延续到1943年后半期即是出于这个原因。战后英国方面的资料显示，这时莫士丁以外的全部地区疾病（buncy-top disease）蔓延，因此这大概也是继续实施移居莫士丁事业的一个因素。顺便提一下，战后英国砍伐了莫士丁以外的全部马尼拉麻，并种上了耐病性（disease-free）强的莫士丁苗。这些马尼拉麻不久也被油椰所取代，现在已踪影全无。

到了1943年，运回物资已经1吨都不可能运出了。因进口断绝，粮食不足亦趋于严重。于是，军队命令移居者砍伐马尼拉麻，种植木薯、番薯、玉米等粮食作物。但这时，各家的劳动能手被征入军队，大多数家庭连自家消费都不能满足。军队当局也承认这种窘状道，“现在生产能力每年有3500吨。但是，由于资材、劳动力不足和转种粮食作物，将减少到年产2000吨左右。昭和19年（1944年）度预计不得不进一步减产。”（滩第9801部队：《北婆罗洲军政概要》，台北，1944年，第145页）

但是，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军队加强了从杜顺族等土著居民和华侨手中夺取粮食，使得原住民方面对军政的反抗愈演愈烈。

到了1945年，婆罗洲守备军为了防备敌军登陆，命令斗湖周边的全体日本人妇女儿童疏散到马旺（Mawing）。马旺位于北婆罗洲西端的大河加拉巴干（Kalabakan）上流，是只有乘小船逆行才能抵达的内地。军队首先带入几十名苦力砍伐树木，建造简陋的住居后，将300—400名日产方面的家属送入，接着再把私人农园的家属送去。疏散者最后达到了700—800名。军队打算让他们在这里自给自足，但该地土质很差，而且已进入雨季，因此不能充分地烧荒，而且劳动力尽是妇女，所以不能充分地种植作物，因过劳、疾病和饥饿，死者不断地出现。“不仅带头进行开垦作业、比男性还能干的妇女成为了不归宿，而且因

粮食不足和天气不好，哪个营地都有卧床不起的病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躺着。……每天都有 1—2 人死去。母亲在病床上，孩子也不能动弹。孩子徘徊在死亡线上，看护的母亲也在病床边呻吟……。这样 100 多人……便死去了”。在死者中，日产移民似乎有 50 名左右。因有人进谏，军队也勉强地承认了惨状。生存者衰弱至极，他们走到布兰羌（译音），在那里呆到了战争结束。但在那里也有十多人死去。

另一方面，通过当地征兵突然成为士兵的移民大多数加入了 1945 年 1 月开始的、从斗湖、山打根到亚比（哥打基纳巴卢）方面的“死亡行进”，在途中的密林里接二连三地死去。该“转移”行动是南方军声称要在北婆罗洲西海岸迎击联军而制定的、无视当地地形的轻率的作战方案，大多数参加者因饥饿、疾病和洪水而死亡。被迫与这一“死亡行进”同行、消失在密林深处的家属也不少。当地居民的反日情绪非常强烈，途中也有不少人被出沒的游击队杀死。

包括与联军的战斗、扫荡游击队作战及在收容所死亡的死者，负责防卫婆罗洲整个地区的第三十七军（1944 年 9 月 18 日改编，改称为“婆罗洲守备军”）的阵亡者达到了 10 500 余人。此外，根据在当地收容所内举行的慰灵祭上公布的数字，在军民合计 15 000 人当中，有 7 000 人死亡。

在当地征集的兵士有多少人在战争中死去？我们不清楚准确的数字。1944 年 5 月在南北婆罗洲（即旧荷、英属婆罗洲）接受征兵检查，同年 10 月入伍的人们在战后组成了“基纳巴卢会”，根据该会名簿（1977 年刊），在 777 名当中，实际上有 40% 的 310 名已经阵亡。会员当中，日产“移居者”为 79 名（其中莫士丁 45 名、斗湖 29 名），其中阵亡者 13 名（莫士丁 5 名、斗湖 8 名）。

根据得到石桥庆道指教的森高明（北婆罗洲会）的“斗湖相关人员逝世者名簿”（1980 年），日产“自营业者”、即移居者及其家属的死亡人员有 81 名。

此外，根据前述的“当地留置财产（各商社）调查表”，在 1937 年北婆罗洲的 31 名私人农园主当中，战败后不久申请“留置土地”价值的只有 14 人。即使一部分在开战前已经撤走，但大部分卷进战乱并失去了联系，而且其中许多人在密林中精疲力竭地死去。

这样，拓务省和日产公司以建设新的殖民地所开始的“移居者”事业、南洋最大的“投资移民”事业终于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特别是在“移居者”身上——而结束了。

（原载原不二夫著《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1986 年 3 月，亚洲经济研究所）

乔 云 译